

【保定研究】

# 唐叔虞始封地在保定唐县考

王天峰

(保定市五帝文化研究会,河北 保定 071051)

**摘要:**晋唐叔虞始封地问题,在晋南与晋中之间长期聚讼不绝,这本身就说明它们各有难解之处。《觉公篋》的发现证明了晋和唐分明是两地。唐叔虞始封之唐在哪里?最早的晋地在哪里?唐地为何发生动乱?晋武侯为何自晋中南迁?晋南晋侯墓地为何没有叔虞墓?通过梳理唐、晋的由来,及由唐到晋阳再到曲沃的迁徙,上述问题将得到初步解答。

**关键词:**唐叔虞;晋国始封地;晋;唐;唐县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志码:**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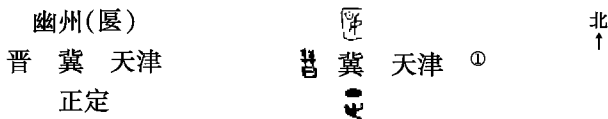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4-0120-07

晋国,在春秋时代曾一度雄视天下的泱泱大国,其源头却一直扑朔迷离。唐叔虞的始封地,学界形成“晋南说”和“太原说”<sup>①</sup>,相持不下,这也说明两说各有难解之处,也是叔虞初封之唐不可能在上述两地的理由。唐叔的始封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其封地又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因此,弄懂晋的含义,找到最初的唐,理清唐晋之变、晋都之迁以及尧文化的流传,才有可能解决晋国始封地问题。因其牵扯面广,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对于晋文化,对于周初历史以及中华文明探源都有着重要意义。

## 一、古晋地在今太原市一带

最初泛指的古晋地在古恒山以西,确指的古晋地在太原晋水附近,要说清楚这一点还必须从京、津、晋、冀的位置关系说起。

山西位于河北省西方,河北省的东部包含天津,北部包含北京即幽燕之地,南部包括正定,正中为冀中之地。它们的位置关系大致如下:






这种位置关系体现着一种古老的宇宙观。

面对浩瀚的太空,现代科学家可以用大爆炸宇宙论推演。这距离人们以太阳为宇宙的中心不过几个世纪而已。而这却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对地球是宇宙中心观念的解放。地心说之前呢?古人如何解释自己的世界呢?

在古埃及,“一天之中,太阳像旅行一样,乘坐着日间的驳船穿过天空,接着降落到西边日落的地方。在那里他搭上夜间的驳船,航行到地下叫做杜拉特的区域,来进行他的夜间航行”<sup>②110</sup>;在古巴比伦,太阳神“乌图/沙玛什”乘车从东边的天庭大门出发,横越天空后到达西边的大门,在准备下一次旅行之前栖息于阴间<sup>③188</sup>;在远古的中国,太阳从东方阳谷的扶桑树出发,乘车飞过天空后到达西方的蒙谷,在下次登上扶桑之前,栖息于阴间的咸池(《淮南子·天文训》)。从昔字的金文可见太阳在咸池的情形:<sup>④1458</sup>。古巴比伦人还把他们的这种思想画在了泥板上,这就是古巴比伦世界地图<sup>⑤</sup>。这块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其画面由两个同心圆组成,古巴比伦以两河下游为中心,

收稿日期:2013-04-29

作者简介:王天峰(1971-),男,河北保定人,保定市五帝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主要从事保定历史地理研究。


①燕国古称医,医的金文:,见于《医公医》载于《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507页;晋字的甲骨文:《合集》19569;正字的金文:,见于《二祀邲其卣》载于《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83页。

其北部是“此地不见太阳”的地方,东方则是太阳升起之地。


古人无法想象自己所在的大地是球面的一部分,他们的世界由“天”和“地”两个平面构成。太阳运行在天空划过的弧线与大地的交点,就是大地的东、西方界限,那里被命名为日出和日落之地;由于中午的太阳在上方偏南,于是先民很自然就想到,往北因照射角度的变小,会出现不见太阳的地方,那里就是大地北方的界限;与此对应,往南就会走到太阳的正下方,那里就成为南界的参考点,再往南居民的屋舍会朝向北方,即反户。


这让我们找到了一把解开上述地名谜团的钥匙。

古黄河沿太行山东麓北行,经保定折向天津入海<sup>①</sup>。考虑到另外三个文明古国都兴起于大河的下游,在保定这片古黄河下游的河畔平原上,出现类似的宇宙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幽州** 西周燕国遗址在北京琉璃河,燕国初封时称“匱”<sup>②</sup>,如克罍铭文“侯于匱”。而“匱”的金文形象地表达了遮挡住太阳的情形:。《说文》:“匱,匿也。”《尔雅》:“燕曰幽州。”幽州即幽都<sup>③</sup>。在《淮南子·地形训》中,幽都被描述为“幽晦不明”和“不见日”的地方。显然,幽州之地与古巴比伦地图中“此地不见太阳”的北方如出一辙。

**天津** 《楚辞·离骚》:“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显然“天津”即日出之地。古瀛州在津、保之间(《魏书·瀛州》),而瀛州正是传说中的日出之所。《星经》:“析木谓之天津。”甲骨卜辞亦有“东方曰析”(《合集14294》)。《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东方阳谷有巨树扶桑,十个太阳一天一个从树上轮值出发。太阳离开扶桑树正是析出的过程,“析木”由此而来。可见,“天津”就是东方太阳升起之地。这与古巴比伦地图中东方为日出之地完全一致。






**正定** 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悬之下为正。”“悬”有时指太阳,如《楚辞·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易·系辞》亦有:“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正”字的古文也说明了这一点:。《说文·正》:“是也,从止。古文正从一足。足者亦止也。”《说文·是》:“直也。从日正,是。”“正”即太阳的正下方,“正定”两字下部古今字都是“止”,“交止”亦可作“交趾”,应是“正定”的别称。交趾通常作为古代王国的南界。

**晋** 按照上述的位置关系,今山西北部应是太阳下落之所。晋字的甲骨文是两个箭头向下指向太阳:,这证实了上述推断。这一点从山西北部古称“并州”也能反映出来。按《淮南子·地形训》的记载,古冀州的东方为太阳升起的“申土”,而古冀州西方的“并土”显然是太阳“并”入大地之所。《帝王世纪》:“晋阳属太原,在冀州太行恒山之西,……于周为晋,今司隶并州之域也。”郑玄《诗谱·唐谱》云太原晋阳“其域在(禹贡)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可见,“并州”即“并土”其义与甲骨文“晋”的含义相同。

泛指晋地在古恒山以西,并州旧地。古恒山即今唐县大茂山,西南距太原180公里,与晋陕黄河与太原的距离相当。认为太原在古恒山正西,这是地理知识不发达时代的产物。直到清代,许多古地图仍然把太原画在古恒山正西。作为并州的首府,太原也就成为确指的晋地。徐才《宗国都城记》说:“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有晋水。”关于晋水的确切位置,《山海经·北次二经》说悬瓮山“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汾水”。《水经·晋水注》也有相应记载:“晋水出晋阳县西悬瓮山。”可见,最早确指的晋地就在太原晋阳。这也就从事实上说明了远在晋国之前晋地就已经存在了。

古晋地的确定,最终使古冀州也被确定在保定一带,这为寻找古唐地奠定了基础。

## 二、古唐地在河北唐县一带

**唐县地处古冀州的核心区域** 既然古冀州在京、津、晋、正定之间,《韩非子·十过》又载尧的天下:“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显然,尧的天下即在今保定及其附近地域。《左传·哀公六年》:“唐、虞及夏皆都冀方。”这个都城应在古冀州的核心区域,古唐也应在其中。如何找到这个核心区呢?在保定中部东西方向,一长串表达太阳运行的地名,起到了坐标的作用:天津—鄭州镇—大冉镇—阳城镇—古恒山—晋阳。莫、冉、阳、恒、晋的古文字形象地表达了太阳的运行:、、、、。从字形上看,太阳出于林木之下,逐步升到树梢,直到天上,然后又落回大地。这一带的易水则指示了太阳在阴间的归途。

鄭州镇在保定东方任丘市,《大明一统志·河间府》:“莫州城,汉属瀛洲。”任丘曾出土战国燕系“莫”戈<sup>④</sup>。《说文》:“莫,从日在艸中。”大冉镇在鄭州镇西,描述日出常用“冉冉”。古恒山即大茂山,《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山》图上,大茂山处标有“常山、华阳”<sup>⑤</sup>。《路史·炎帝》有“常羊,华阳之常阳也”。可知,恒山又名常阳。而“常阳之山,日

①“流共工于幽州”《尧典》记“幽州”、《史记·五帝本纪》记“幽陵”、《庄子·在宥》记“幽都”。可知幽州、幽都、幽陵是一地。

②《甲2687》,《早》(英198),《籀》见《金文编》第667页,《𠄎》见《金文编》第881页。

月所入”(《山海经·大荒西经》)。这些地名所包含的意义与其古字所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

在阳城与古恒山之间,即古冀州的核心区域有尧城,历史上曾隶属于唐县,笔者有专论说明尧都就在这里<sup>①</sup>。《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中的《禹河之图》上,今保定地区为“冀”,而“冀”的中部则标着“尧都”<sup>[10]202</sup>。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北燕》图上,唐县故城处标有“阳(唐)”<sup>[9]28</sup>。这些都说明古唐地应在今唐县一带。

**唐县是唐尧始封地** 《帝王世纪》:“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注引张晏说:“尧为唐侯,国于此。”《元和郡县图志·定州》:“唐县,即古唐侯国,尧初封于此。今定州北有故唐城。”唐县有封山,相传为唐尧受封处,今唐县存古唐侯国碑<sup>[11]45</sup>。

**唐县是陶唐氏起源地** 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原始社会部落分布图上,唐县一带标出“陶唐氏(帝尧)1”,太原、临汾之间标出“陶唐氏(帝尧)2”,并注明:“数字表示迁移顺序”。徐旭生说:“陶唐氏旧地应该是今河北省唐县、望都一带。”<sup>[12]164</sup>周长富先生说:“陶唐氏古族大概是从唐县、望都一带出发,南下行唐,沿滹沱河过井陘,途径太原,再进入汾水平阳。”<sup>[13]</sup>

从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的命名规则可初步判断,陶应是陶唐氏的重要文化特征。定窑遗址在唐县与曲阳县交界处,树大根深,源远流长,定窑能够名闻天下,其陶器时代肯定更加久远。距定窑遗址20公里有仰韶时代的钓鱼台遗址,曾出土彩陶<sup>[14]138</sup>。在定窑遗址以南70余公里处的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曾出土原始瓷器<sup>[15]4</sup>。唐地有陶,陶唐氏当因此得名。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说范氏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唐县恒山脚下的军城盆地有小猪山和几个韦村,小猪为豕,这一带或为豕韦氏故地。这一点从本地区方圆15公里内的一组地名在鲁西南被放大到方圆150公里也可看出,即从“军城镇、猪山—韦村、范家庄、定窑”到“郟城县、滑县(豕韦故国)、范县、定陶县”。鲁西南地区也有着丰富的陶唐氏文化。

**唐县在河、汾之东** 《战国策·齐策》:“魏处曰,赵可取唐、曲逆。”《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禁)恒山而守三百里,过燕阳、曲逆,此代马、胡狗不东,仑山之玉不出。”《战国策·赵策》记作:“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燕之唐、曲逆,此代马、胡狗不东,而昆山之玉不出也。”可证唐在燕赵交界、古恒山附近。燕国古玺印有“唐都丞”<sup>[16]20</sup>,亦可证此唐地的存在。

《史记·晋世家》:“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河、汾之东”是泛指的地名概念,在黄河或汾河边上显然都不能说在“河、汾”之东。如说太原为河东太原,说管岑山在河之东(《山海经·北次二经》)。这两地西距晋陕黄河都有一百多公里。《帝王世纪》说太原在冀州太行恒山之西,显然亦可说古恒山在太原之东。太原在汾河边上,且在河东。因此,可说古恒山在河、汾之东。而唐县在古恒山脚下,因此唐县就可说在河、汾之东。在《中国古代地图集》之《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上,按“西河—太原—恒山—恒河(唐河)”东西方向排列<sup>[10]197</sup>。这反映了古人地理知识的局限性,也体现了时代特征。

可见,古唐地在唐县一带,从古代地图反映的地理观念看,唐县在河、汾之东。

### 三、唐县是唐叔虞的初封地

关于唐叔虞初封的文献记载:

《史记·晋世家》:“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字子于。”

《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阍伯,季曰实沈,……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

分析上述文献可得出如下两点。首先,周初唐叔虞所封之唐,有着爆发叛乱的客观条件。灭唐之后即封叔虞于唐,且叔虞还未成年,受封时间在桐叶生长季节。其次,唐地一带历大夏、唐人到叔虞三代,文化底蕴丰厚。

①王天峰著《尧都保定顺平县尧城村考》待刊载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 周初唐县一带的叛乱与叔虞初封

**唐县与殷商起源地有着紧密的地缘关系** 唐县南距殷墟所在地安阳市 270 公里，北距殷商起源地安阳镇 16 公里<sup>[17]</sup>。再北即是殷先祖上甲所伐灭之有易国故地易县，在易县与涑水县交界处曾出土北伯铜器，或为商代北国故地<sup>[18]885</sup>。安阳镇和涑水县在永定河与唐河（灏水）之间，丁山先生说：“我敢论定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灏水之间。”<sup>[19]17</sup>沈勇先生<sup>[20]</sup>和尚友萍先生<sup>[21]</sup>分别从考古角度对这一地区的先商文化做了进一步的论证。

反观晋南，则为周的传统势力范围，有众多周同姓早期封国，是周灭商的大后方。武王灭商前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清华楚简证明武王八年周即推进到黎城<sup>[22]</sup>。唐若在河东没有反周的政治基础。

**唐国与商关系密切** 从甲骨卜辞可见唐与商有着密切的关系。卜辞有“使人往于唐”（《合集》5544）、“作大邑于唐”（《英藏》1105 正）。商王还去唐地田猎，如“田于唐”（《合集》11000）等。金岳先生论证“甲骨文的唐当在今河北唐县境”<sup>[23]</sup>。

**周公平叛与叔虞封唐** 《逸周书·作洛》：“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殁于歧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国语·晋语四》记这一年是：“武王克商，岁在鹑火。”

《逸周书·作洛》：“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依岁星纪年即鹑尾。

《逸周书·作洛》：“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返回王朝的发源地，几乎成为历代被推翻统治阶级残余势力的共同取向。因为在那里才能找到最安全的庇护所，或者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禄父北奔的目的地显然是殷商的起源地北国地带。唐地是禄父北奔的必经之地，也是故北国的南方门户。唐参与了叛乱。周公在平定三监后紧接着开始了灭禄父的征程，唐地首当其冲。《今本竹书纪年》：“冬十月，王师灭唐。”按岁星纪年这一年是寿星。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随着唐的灭亡，殷商的老巢南大门洞开，禄父在劫难逃。叔虞封于唐亡之时，唐灭亡在冬季，与桐叶封唐的季节不符。显然封唐发生在来年，即成王三年。此时成王、叔虞皆少年，与记载相符。按岁星纪年这一年是大火。《国语·晋语四》：“晋之始封，岁在大火。”

周公进击殷商老巢，一场恶战在所难免。这难免让人想起同样发生在这一带的战事。中山国就要被赵国灭亡了，伴随着隆隆的战鼓、震天的杀声，中山人“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吕氏春秋·开春论》）做殊死的抗争。歼灭殷商顽固势力之战可想而知。淑闾村北 3 公里处的南放水商周遗址，“表现出了周文化对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改造”<sup>[24]</sup>，当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反映。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周公想到的自然是惠及百代的长治久安之策。“恰”在这时，“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史记·鲁世家》）。《尚书序》云唐叔“食邑内得异禾，亩莖颖穗也，禾各生一莖而合为一穗，拔而贡之”。《史记·周本纪》：“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东土。”《尚书序》：“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禾，旅天子命作《嘉禾》。”归禾于周公意在表彰，这又是为什么呢？《尚书序》给出了答案：“异亩同颖，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

在笃信天命的时代，天降和瑞无异于一道停战诏书。伴随着《归禾》与《嘉禾》的传诵，殷商余民与周人走向和解。两株共一穗的谷禾，留下了千古之谜，体现的却是周公高超的政治智慧。

因周公之德所致，唐地出现嘉禾，唐叔献禾，成王作《归禾》，并赐还给在东方兵营坐镇的周公，周公奉命作《嘉禾》。这些说明周公与唐叔都在唐地，若把唐放在晋南，无论从作战的方向还是作战的长期性，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唐县淑闾村西南 18 公里，嘉禾山静静的躺在唐河南岸的平原上，见证着这段历史。

## 2. 唐县一带从大夏、陶唐至叔虞周文化的传承

**大夏** 《国语·齐语》载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泚，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溪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桓公称其“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石枕”实为“实沈”音讹。由此可知，齐桓公西伐之大夏即实沈所迁之地。且大夏在太行卑耳山前、白狄之地。《郁离子·燕文公求马》记载燕国有卑耳氏。燕国地跨燕山与太行山，可知卑耳氏之地在燕国南方太行山近古中山国一带。《后汉书·郡国志》：“中山国新市有鲜虞亭，故国。”《世本·姓氏篇》：“鲜虞，姬姓，白狄也。”可见大夏在中山国近古恒山区域。

齐桓公因救燕而北伐山戎，因救宋而南征楚，因救邢西伐大夏之白狄。可知大夏在邢附近。“狄伐邢”（《春秋·

庄公三十二年》)《吕氏春秋·简选》记作“中山亡邢”,又说“桓公更立邢于夷仪”。高诱注:“中山,狄国也,一名鲜虞。”由此进一步证明,齐桓公救邢所伐之白狄、大夏实为中山国。

《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对此《路史》、《吕氏春秋》均有记载,可知黄帝时代的大夏在昆仑之东。《淮南子·时则训》:“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所道。”可知古恒山在昆仑之东。《穆天子传》载穆王北过滹沱河后自古恒山一带西去昆仑方向,也与此相合。前文祭恒山则赵之昆仑之玉不出,也说明恒山与昆仑的关系。笔者论证五台山正是古代的昆仑山<sup>[25]</sup>,此又可证大夏在五台山东古恒山附近。

新乐县有伏羲台、伏羲庙,也有相关的考古学文化<sup>[26]</sup>。羲、夏古代通用,说明这一地区的大夏文化并非空穴来风。

北京密云县一带古称行唐。《大清一统志·顺天府》:“行唐废县,在密云县东。”《大明一统志·顺天府》:“共城,在密云县东北五十里。《括地志》故共城在檀州燕乐县界,乃舜流共工于幽州地。”这说明行唐县与共工族有着某种联系。《中国历史地图集》赵中山图上,古恒山近旁的行唐县为“南行唐”<sup>[27]</sup>。《山海经·北次三经》:“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虡池。”即共工族与滹沱河存在联系,今行唐县南邻临滹沱河。由此推断,共工族的原居地当在今行唐县一带,亦在泛指的大夏之地。

谭其骧先生考证“禹河”在中山国东南部,当是大禹治水区域。《史记·李斯列传》载:“禹凿龙门,通大夏。”《尚书·禹贡》记大禹治水“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大夏、恒卫、大陆”皆在中山国内。功在中山国,通常封地亦当在此。大禹封在大夏之地,名“夏后氏”亦显合理。如果说登封的“阳城、颍川、箕山”是夏文化特征之一,那么唐县、行唐、新乐亦有“阳(唐)、颍水、共水、箕山”等<sup>①</sup>,足证此地的夏文化因素。根据淑间村遗址的发掘,“将(灰坑)H3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至三期较为合适”<sup>[27]</sup>。这就从考古上证明了这一地区存在夏文化因素。也说明大夏之地亦可称作“夏墟”。

唐灭大夏 《逸周书·史记解》:“唐氏伐之,共工以亡。……唐氏伐之,……西夏以亡。”《博物志·杂说上》:“唐伐之,西夏亡。”此西夏与大夏所指应是一地。《尚书·尧典》载尧时代“流共工于幽州”。可见,大夏与共工都灭于唐尧时代。由此开启了唐人对大夏的统治,即“唐人因之”的时代。

保定的顺平县以尧帝故里著称<sup>[28]</sup>;庆都县(望都县)因尧母庆都而得名<sup>[29]</sup>;唐县源于唐尧的初封。这些应是尧文化盛极一时的有力见证。

“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括地志·翼城县》引《春秋传》云:“刘累者,以豢龙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氏御龙,……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唐侯。”甲骨卜辞有“唐不惟侯唐”(《合集》39703),说明了商代唐侯国的存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说范氏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反映了这段历史。

周灭唐 《史记·晋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自此,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贵血统的古唐国就这样灭亡了。唐地余民也被迁往各地,一如他们的祖先把共工族从南方迁到遥远的北方一样。

古老的唐地又迎来新的主人,从大夏算来已是第三次,这就是“其季世曰唐叔虞”。

唐县为鲜虞故地。《元和郡县图志》:“唐县,春秋时鲜虞邑。”吴静安先生断定“鲜虞、狐、贾、胡同音相近,实为一族”<sup>[30]</sup>。《元和姓纂·卷七·贾》:“唐叔虞少子公明,康王封于贾。”《路史·高辛纪》:“周之初兴,大封同姓,北燕、鲜虞皆姬姓国也。”《国语·晋语四》:“狐氏出自唐叔。”可见,鲜虞出自唐叔。《穆天子传》穆天子北过滹沱河后,“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顾实认为其地在常山即恒山附近<sup>[31]</sup><sup>[17]</sup>。可见,胡氏确在古恒山鲜虞之地。李学勤、李零二位先生认为“战国中期的中山是春秋鲜虞之延续”<sup>[32]</sup>。《中山王方壶》铭文:“天子不忘其有助,使其老策赏仲父”,周室称同姓为伯父叔父,称异姓为伯舅、舅氏,据此可知中山为姬姓<sup>[30]</sup>。唐县及其周围的鲜虞文化与唐叔虞有着直接关系,可以说,鲜虞、中山皆叔虞之后。

唐县有淑间村,此村名当源于唐叔虞。淑间显然是叔虞的音讹。淑间村发现了商周聚落遗址<sup>[33]</sup>,这进一步佐证了淑吕村与唐叔虞的关系。

## 四、唐晋之变与晋都之迁

### 1. 从唐县到晋阳

西周铜器《觉公簋》有铭文:“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sup>[34]</sup>这种唐、晋之变也得到了文献的佐证,

<sup>①</sup>唐县有许由坟、箕山、淇水,参见宗健著《河北唐县宗高和村宗氏家谱》,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374页;《乾隆新乐县志·郟河》:“郟河,在行唐县南里许。源出县西北雨岭山谷间曰颍水南行三十里,经箕山之东许由村之北,即所云洗耳溪也,又东流曰郟河。”

如《史记·晋世家》：“唐叔子燮，是为晋侯。”从《史记·楚世家》：“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可知，王命“侯于晋”是在成王时期。这一时期，唐乱已消除，在南有邢、卫，北有燕地的情况下，唐地的“藩屏周”作用大不如前。而晋阳作为山西南北交通咽喉，其战略地位逐步显现出来。这应当是唐伯侯于晋的历史背景。

晋中南为周的传统势力范围，有众多周同姓封国，社会长期稳定，燮父所迁太原为富庶之地，这就为晋侯大兴土木提供了可能。如同营建洛邑耗时数年一样，营建晋都也决非短时间所能做到。这或许是王命在成王二十八年，直到康王九年唐才迁于晋的原因，这时，晋阳的宫城已完工，且工程浩大。（《今本竹书纪年》：“康王九年，唐迁于晋。晋侯筑宫而美。”

《括地志·并州》引徐才《宗国都城记》：“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旁，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处。”《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二》：“唐叔虞墓，在县（晋阳）西南十六里。”《水经·晋水注》：“晋水出晋阳县西悬瓮山。县，故唐国也，有唐叔虞祠。”文献见证了这段历史，也更加明确地说明了燮父所迁之晋地就是晋阳。在晋祠南的牛家口村有两座封土堆，相传为晋王陵和燮父墓<sup>[39][23]</sup>。

宏伟的楼台给了晋国一个闪亮的开始，却并没有给晋侯带来好运。

## 2. 从晋阳到曲沃

《古本竹书纪年》：“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宫室美，说明建筑已完工。从其用时可能超过成周洛邑，可见其僭越之严重；就其载入史册而言，这是一起重大历史事件。在以礼治国的周代，因僭越被斥责，必招致相应惩罚，晋侯被赶出华美的宫室是显而易见的。燮父退位、其子迁都也就在情理之中。看来，晋阳是呆不下去了。

从《史记·晋世家》可知，燮父之子为武侯。《汉书·地理志·闻喜县》：“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汉书·古今人表》：“晋武公，燮子。”晚出的《诗谱·唐谱》说叔虞曾孙成侯南徙居曲沃，显见是把“武”误作“成”。酈道元未被误导，《水经·涑水注》依然坚持“古曲沃也，晋武公自晋阳徙此”。《通典》卷一百七十九，曲沃下自注：“汉绛县也，春秋时晋曲沃地，台骀祠在此。”今曲沃县为古曲沃所在。

武侯在曲沃又新筑宫室，按《周礼》，在宫城之左前要新建宗庙。武侯的宫室加宗庙应是后来的武宫，成为后世晋君祭祖之所。如《史记·晋世家》记重耳“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sup>[36][18]</sup>，在天马—曲村遗址的晋侯墓葬中，依据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墓主初步断定为从晋武侯到晋文侯前后相继，但墓中独少唐叔虞及燮父墓。朱凤瀚先生<sup>[37][145]</sup>和贾洪波先生<sup>[38]</sup>有关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研究成果，也说明这里没有唐叔虞及燮父墓。这应当是符合事实的。

## 四、结语

晋国的始封、晋都的迁徙及尧文化的传播是周初特殊的政治环境及一系列政治斗争的产物。通过梳理周初的政治形势，可以大致还原晋国初封及晋都迁徙的基本状况：武王崩引起三监之乱，殷王子禄父北奔祸及殷商起源地近旁的唐国——今唐县一带；周公灭唐并封叔虞于唐；成王命唐伯侯于晋，于是燮父开始在晋阳大兴土木；到康王时代，晋侯因宫城规制严重僭越周礼，招致责让，燮父之子武侯被迫迁都曲沃，并筑宫室，立宗庙，武宫也成为后世晋君朝宗之地。在这一过程中，唐地余民承载着尧文化也不断随迁。

叔虞封唐，其地在古大夏。从高辛氏之子实沈迁大夏，到唐人据之而服事夏商，三传至唐叔虞。晋国的初封地被涂上了层层迷彩，也说明非有深厚之华夏、炎黄文化之地不足以当之。从文献到考古，从地名到传说，从古文字到古地理，都可证明唐县及其附近区域为大夏旧地，唐尧故里，殷商起源地。唐县作为叔虞初封地当之无愧。

晋文化锦绣斑斓，雄浑壮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无不得益于其丰富的政治阅历及精深的文化渊源。

## 参考文献：

- [1] 马保春. 文献所见晋始封地的记述与论说[J].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5): 55-60.
- [2] 海伦·斯特拉德威克. 古埃及[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
- [3] 斯蒂芬·伯特曼. 探索索不达米亚文明[M]. 秋叶,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4] 容庚. 金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5] 裴纓晏. 巴比伦世界地图: 人类最早的“世界地图”[J]. 地图, 2009(4): 144-147.
- [6] 谭其骧. 《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C]//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73-193.

- [7]琉璃河考古队. 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 1984(5):405-416.
- [8]李学勤, 郑绍宗. 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铭青铜器[C]//古文字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9]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Z].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 [10]曹婉如, 郑锡煌, 黄盛璋, 等. 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11]韩海山. 唐尧文化研究文集[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2.
- [12]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13]周长富. 浅谈唐尧氏[J].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1):147-155.
- [14]张立柱. 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通览[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 [15]唐云明. 唐云明考古论集[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
- [16]故宫博物院. 古玺汇编[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
- [17]王天峰. 殷商起源于保定西部安阳盆地考[J]. 殷都学刊, 2010(4):35-43.
- [18]王国维. 观堂集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9]丁山. 商周史料考证[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 [20]沈勇. 商源浅析[J]. 文物春秋, 1990(3):54-58.
- [21]尚友萍. 先商文化源头考辨[J]. 文物春秋, 2012(5):3-10.
- [22]沈建华. 清华楚简武王八年伐郟刍议[J]. 考古与文物, 2010(2):102-104.
- [23]金岳. 易水天堑方国政——论“先燕”民族文化(续)[J]. 文物春秋. 1992(3):10-22.
- [24]段天, 朱永刚. 南放水遗址夏和西周时期遗存的初步认识[J]. 考古, 2011(4):61-69.
- [25]王天峰. 古昆仑即五台山考[J]. 五台山研究, 2011(4):44-47.
- [26]宫长为. 新乐与伏羲文化的播迁[J]. 学习与探索, 2009(1):217-222.
- [27]河北文物研究所, 保定文物管理所, 唐县文保所. 唐县淑闾村遗址 III 区发掘简报[J]. 文物春秋, 2012(4):29-31.
- [28]王炳刚, 杨军华. 尧乡赋[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
- [29]周长富. 尧母庆都考[J]. 保定学院学报, 2011(6):114-118.
- [30]吴静安. 中山国始末考述[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79(3):87-92.
- [31]王貽梁, 陈建敏. 穆天子传汇校集释[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32]李学勤, 李零. 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J]. 考古学报, 1979(2):147-170.
- [33]刘连强. 河北唐县淑闾遗址考古发掘获重要成果[N]. 中国文物报, 2006-12-15(5).
- [34]朱凤瀚. 觉公簋与唐伯侯于晋[J]. 考古, 2007(3):64-69.
- [35]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 中[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6.
- [36]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 [37]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38]贾洪波. 再论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墓主年代序列[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5):58-67.

## Research on Tang Shuyu's Early Fief is Tang County of Baoding

Wang Tianfeng

(Five Emperors' Civil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Baoding, Baoding 071051,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Jin Tang Shuyu's early fief between Jinnan and Jinzhong is in dispute for a long time. It shows that both of them have difficulty to explain in some aspects. The founding of *Yaogong gui* proves that the Jin and Tang are two places. Where is the Tang of Tang shuyu's early fief? Where is the earliest Jin? Why the unrest takes place in Tang? Why dose Wu Hou migrate toward to south from Jinzhong? Why the Shuyu's grave is not in Jin Hou's graveyard? By combing the origin of Tang and Jin, as well as the migration from Tang to Jin and to Jinnan. These problems will get the preliminary answer.

**Key words:** Tang Shuyu; early fief in Jin; Tang; Jin; Tang county

(责任编辑 张春生)